

# 李斯炽经营《医药改进月刊》始末

陈宇晗

**摘要：**《医药改进月刊》由成都中医李斯炽创办于1941年3月，约1943年10月停刊。该刊是民国时期成都地区重要的中医药刊物之一，它的刊行凝聚了以李斯炽为代表的四川中医药界人士的心血，以及他们期望中医药学得到改进并发扬光大、救国救民的心愿。作为一份专业性刊物，它在兼顾学术性和科普性的同时，由于物价飞涨、经营不善等最终被迫停刊。《医药改进月刊》的命运透视出民国时期中医药行业，以及专业学术性期刊的窘境。

**关键词：**中医药期刊 李斯炽 《医药改进月刊》 四川国医学院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西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传统的中国医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废止中医案》，中医陷入了不得不变革的地步，因而在中医界内部有“中医之改进，责在中医自身，若不自己奋发，必无好果”的论调。<sup>①</sup>为了在民众中宣传中医并且谋求自身的发展出路，1920年代后出现了一大批中医药期刊，这些期刊内容丰富、各具特色，在全国占有突出的地位。<sup>②</sup>其中，成都中医李斯炽创办的《医药改进月刊》在四川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李斯炽，名煥，祖籍河南阌乡，1892年生于四川成都。1915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今四川大学）理化系，随后留校做理化助手，并在成都几所中学兼任教职。1920年代末，由于中医药事业面临绝境，李“激于义愤”，“怀着‘兴亡继绝’的悲愤心情”辞去所有教职，

① 《医药团体总联会执常两会纪》，《申报》1929年3月30日，第14版。语出自丁仲英。

②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福建、北京等地，对于四川地区的研究见王友平：《近代四川医药卫生报刊述论（1911—1949）》，《天府新论》2009年第4期。有关中医药期刊史的长时段研究，参见郭妍：《中医药期刊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8年。

“投身于拯救中医的活动”。<sup>①</sup> 1932年，他与中医界同道组成四川医学会，积极参与霍乱防疫。1936年，他和赖华锋、邓绍先、何伯埙等人联合创办四川国医学院（今成都中医药大学前身），他先后担任教务长、副院长、院长等职。<sup>②</sup>

1941年，李斯炽等人创办了医药改进月刊社，并于当年3月开始出版中医药刊物《医药改进月刊》。该刊虽创办时间不长，但它“意在以科学的方法，发皇古医之奥义，切整齐同仁步调，一致向前，务使古圣之遗意无余，中西之各美兼备，而我国医之伟绩，长留于万世”。<sup>③</sup> 这本中医药杂志不仅保存了很多珍贵的中医文献资料，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 一、《医药改进月刊》的创刊

1930年代中期，中医界为了求生存和发展，多次直接向中央政府请愿，其中参加1936年请愿的人数多达120余人，来自18个省市。<sup>④</sup> 这令李斯炽意识到，要想使中医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需要加强中医药界的团结，争取社会同情和支持。<sup>⑤</sup> 报刊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工具，对于方便交流沟通和营造舆论氛围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李斯炽在中医药期刊的创刊高峰期，创办了《医药改进月刊》的前身《医药改进报》。

《医药改进报》出现于1936年7月，根据1939年3月的登记表记载，该报每周出版四开大小一张的报纸，每期销行一千份，主要刊载“国医药著述及学理之研究发明、国医药论文等”<sup>⑥</sup>。但在1939年底的统计中便标注为停刊，且相关情形“无从查考”<sup>⑦</sup>。

除了自己亲力亲为外，李斯炽还支持和鼓励学生于1938年创办了《中和医刊》。<sup>⑧</sup> 他在该刊的发刊词中评价这十年来的中医事业：

<sup>①</sup> 李经纬、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158页；《成都中医学院部分专家、教授介绍：李斯炽》，陈先赋主编：《成都中医学院发展简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95页。这一说法来源于李斯炽之子李克光，而按照李克光的说法，其父是由于“目睹庸医杀人”，而在董稚菴的启发下投身中医事业。见李克光：《李斯炽教授治学纪要》，山东中医学院院报编辑室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三辑），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第216页。

<sup>②</sup>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人物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66页。

<sup>③</sup> 《发刊词》，《医药改进月刊》1941年第1卷第1期，封面页。

<sup>④</sup>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sup>⑤</sup> 陈懋鲲：《成都名老中医李斯炽先生传略》；《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66页。

<sup>⑥</sup> 《成都市通讯社调查表》（1936年7月），四川省档案馆，民41—4554；《新闻纸、杂志调查表》（1939年3月23日），成都市档案馆，38—4—5756。

<sup>⑦</sup> 《成都市新闻纸杂志停刊情形调查表》（1939年11月16日），成都市档案馆，38—4—5756。

<sup>⑧</sup> 李继明：《李斯炽》，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年，第286页。

自民一八（即民国 18 年的《废止中医案》——笔者注），国医药界遭受废止中医中药提议之打击以还，全国同道，莫不疾首痛心，发愤为雄，勇往迈进，急起直追，以求挽回此一线将斩之国脉，阐发数千年固有之学术。一时，杂志刊物，风起云涌，提倡研讨，不遗余力，八年于兹，成绩渐著。……不幸倭寇肆掠，侵我中土，致素称文化中心之京沪，沦陷敌手，各种医学杂志，一齐停刊。始露一线曙光之国医药界，又复黑暗沉沉。漫漫长夜，谁作暗室之灯；蒙蒙天壤，安得南针之示。<sup>①</sup>

从整体的中医药报刊发展史来看，1937—1949 年为其低谷期，创办数量骤减，已有的报刊也被迫大面积停刊。<sup>②</sup> 李斯炽没有选择继续等待，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试图找寻指引中医前进方向的灯塔，于是便有了《医药改进月刊》。

1941 年 2 月，李斯炽计划重启《医药改进报》。为了使“时间充裕，工作便易理合”，他准备将周刊改为月刊出版，即《医药改进月刊》。<sup>③</sup> 3 月初，创刊号选在国医节前面世。而刊物的登记手续则一直持续至 6 月下旬，在已经出版四期之后，李斯炽关于《医药改进月刊》的申请终于得到了成都市政府和四川省政府的批准，得以通过。<sup>④</sup>

## 二、《医药改进月刊》的主要内容

《医药改进月刊》自 1941 年 3 月创刊至约 1943 年 10 月停刊，期间共发行 31 期。其栏目设置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时事类，如言论、短评、消息等栏目；医药研究类，包括医药研究、医学专著、临床经验、经方验方等方面；读编交流类，如读者信箱、医药顾问等栏目。

在时事评论类的文章中，该刊极力向读者群体宣传自己“改进医药”的主张，甚至强调改进中医的重要性“差不多和创造新中国的意义，一并重大”。<sup>⑤</sup> 李斯炽在亲自执笔的《战云笼罩下中国医药的重要性》一文中也提出要“为中医建筑坚固不拔的基础”，使中医在抗战当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sup>⑥</sup> 在之后的一系列文章中，还提出了改进中医及“建设中国本位医学”的构想。纵观这些集中于中医改进、中医教育、医生自身素质等方面的评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

<sup>①</sup> 思直：《发刊词》，《中和医刊》1938年第1卷第1期，第2页。

<sup>②</sup> 郭妍：《中医药期刊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8年，第20页。

<sup>③</sup> 《医药改进月刊社为呈请改医药改进周刊为月刊恳予鉴核转请备查由》（1941年2月），成都市档案馆，38—4—5145。

<sup>④</sup> 《成都市政府批示社字第 1286 号》（1941 年 5 月 20 日），成都市档案馆，38—4—5145；《成都市政府为转呈医药改进月刊社登记声请书及图记印模请予鉴核示遵由》（1941 年 6 月 20 日），成都市档案馆，38—4—5145。

<sup>⑤</sup> 刘安澜：《为什么要改进中医》，《医药改进月刊》1941年第1卷第1期，第4页。

<sup>⑥</sup> 李斯炽：《战云笼罩下中国医药的重要性（续）》，《医药改进月刊》1941年第1卷第3期，第4页。

中医药界自身并不保守，迫于形势压力，有些医者直接提出了发展“中西医结合”的思路：“中医长于治疗，西医精于病理”，所以应及早设立“中西医院”。<sup>①</sup>此外，对于时下热点的中医事件，该刊在卷首页采用短小的篇幅进行评论，言论犀利，观点鲜明。一长一短共同构成了评论版块。

医药研究类内容是《医药改进月刊》的主体部分，文章数量和篇幅占比较大。民国时期瘟疫暴发极为频繁，当时成都地区最为流行的疾病是霍乱、痢疾、猩红热、伤寒、麻疹等。<sup>②</sup>该刊对于这些疾病，以及疟疾、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脑脊髓炎、肺结核等疾病的症状、病理及治疗方案都做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其中，涉及霍乱的有《霍乱病的普通治疗法》一篇，涉及痢疾的有《痢疾漫谈》等五篇。这些文章不仅有利于学术交流，还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应对疫情的有效途径。在刊载文章的同时，该刊还对一些医书进行连载，包括《猩红热之研究》《伤寒论释义》《长沙串注方歌》《国医气化学》《中国法医学之研究》等，使这些珍贵的民国医书通过另一种方式得以保存，为当代学者研究中医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sup>③</sup>

除了学术性的讨论外，《医药改进月刊》还介绍和宣传了很多医疗卫生方面的小常识，例如《当心你的耳朵！》《女子的月经》《假如你爱你的小宝宝，不要忘了“早些种痘”》《如何健全我们的牙齿》《吃了水果的好处》等。这些文章大多浅显易懂，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且行文亲切生动，将深奥的医学道理直观传达给普通的民众，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例如，吴杰人在介绍水果营养物质的文章中，将营养学用形象的比喻加以诠释，“假定人体是一部机器，则蛋白质是修理或补充这件机器内部所消耗的材料，而淡水化物是燃料，……要使机器动得快，燃料一定要用得多，水果是最好不过的燃料了”。<sup>④</sup>李士珍借助《如何健全我们的牙齿》一文，向民众宣导睡前、饭后清洁口腔的必要性，并教读者如何选择合适的牙刷等知识。读编交流栏目读者信箱、医药顾问等主要为读者解答有关中医药方面的问题。它曾先后25次，为共计75名读者答疑解惑，主要包括治病用药和中医药学习两类。这些栏目面向人群广，切合刊物封面“人人必读，家家应备”的口号。虽然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有助于扩展读者群体和宣传卫生知识。

总体来看，该刊内容较为充实，兼顾到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既可以使中医药从业者了解资讯和交流经验，也可以丰富医药爱好者乃至普通民众的相关知识，兼具学术性与科普性。

<sup>①</sup> 李重人：《如何沟通中西医学？》，《医药改进月刊》1942年第2卷第4期，第3页。

<sup>②</sup> 四川省志卫生志编辑组：《解放前四川疫情》，《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87页。

<sup>③</sup> 例如陈重方在研究中引用了《医药改进月刊》所刊载的5篇文章，详见陈重方《〈洗冤录〉的流传与中国检验制度的建立》，硕士学位论文，台北大学古典文献与民俗艺术研究所古典文献组，2012年。

<sup>④</sup> 吴杰人：《吃了水果的好处》，《医药改进月刊》1942年第2卷第8—9期合刊，第40页。

《医药改进月刊》的撰稿人数量较多，办刊的两年多时间内，先后共有 120 余人发文。其中发文最多的是创刊时年仅 29 岁的余仲权，他当时任职于四川国医学院，发表文章数量达到了 44 篇，远远超过其他撰稿人。<sup>①</sup> 其他主要撰稿人也都仅二三十岁，例如徐庶遥（28 岁）、陈义文（27 岁）、苏友农（32 岁）、曾敬光（23 岁）、戴佛延（28 岁）等。<sup>②</sup> 而李斯炽在创刊时亦不足 50 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成都及周边地区开业行医，有很多与四川国医学院、中国国医学会成都市分会有关联。由此可以推断该刊的主要影响范围集中于川渝地区，代表了当时四川年青一代中医界的认知。

### 三、《医药改进月刊》的经营

战时，由于大量报刊迁往成都、重庆等地继续出版，使四川地区报刊业的竞争颇为激烈，加之物价频繁波动，很多杂志仅发行数期便难以为继。在这一情况下，增加广告收入和扩大读者数量是维持杂志良好经营状况的主要途径。

作为专业性杂志，《医药改进月刊》在广告事业上很难有所作为，广告类别单一、数量较少。日常主要刊登的广告包括医学书刊、药房诊所，以及少数遗失启事。在广告收入不足的情况下，杂志的日常销售收入就成了杂志的主要收入来源。决定销售收入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售价，二是销售量。刊物的售价对其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售价的制定是在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同时也体现着办刊者的经营理念。《医药改进月刊》的售价，因受到战时物价的波动而多次进行调整，从创刊（0.4 元）到停刊（3 元），单册价格累计上涨了 6.5 倍。但是这一现象并非个例。以当时成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新新闻》作对比，《医药改进月刊》创刊日《新新新闻》的零售价为每份 1 角 5 分，<sup>③</sup> 及至停刊，《新新新闻》的零售价也已上涨至每份 2 元，上涨竟超过 12 倍。而成都另外一家发行量稍逊于《新新新闻》的《华西日报》，其零售价格也在 1943 年 6 月到 10 月的不足半年间上涨了 1.5 倍，在 1943 年 10 月也达到了每份 2 元，与《新新新闻》持平。<sup>④</sup> 而《医药改进月刊》在最后一次调价之后的价格也仅为 3 元，相对于每期 10 版左右的《新新新闻》，这个价格并不算昂贵。<sup>⑤</sup> 并且随着单册价格的上涨，该刊对于半年订阅和一年订阅的优惠幅度也逐渐增大，更利于长期订户。

<sup>①</sup> 《中医人员证书存根中字第 1945 号》（1943 年 10 月），四川省档案馆，民 113—365。

<sup>②</sup> 《中国国医学会成都市分会文化服务社职员简历表》（1942 年 4 月 26 日），成都市档案馆，38—2—2301；《四川省医药学术研究会职员名册》（1945 年 3 月 16 日），四川省档案馆，民 113—2095；《中医人员证书存根中字第 1519 号》（1943 年 2 月），四川省档案馆，民 113—353。

<sup>③</sup> 《新新新闻》1941 年 3 月 1 日报头；《新新新闻》1943 年 10 月 1 日报头。

<sup>④</sup> 《华西日报》1943 年 6 月至 10 月报头。

<sup>⑤</sup> 《医药改进月刊》1943 年第 3 卷第 4—5 期合刊，第 34 页。

报刊大幅涨价的背后，是由于成都的物价“已自以前的全川最低成为现在的全川最高”。<sup>①</sup> 据统计，1942年成都的零售物价指数比1941年增加2985，1943年比1942年增加11696。自1940年始，成都物价呈几何增长态势。<sup>②</sup> 而相对于有大量广告收入的报馆，《医药改进月刊》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处境自然也就更为艰难。

刊物的发行离不开可靠的销售网络。《医药改进月刊》在创刊之初以位于成都兴禅寺街的四川国医学院为发行点，短短几个月间，增设了西御西街的爱知诊疗所、帘官公所街的峰凌药号等医药相关的机构作为代售处，甚至还在重庆和简阳设置了分发行处。<sup>③</sup> 1942年，原有的销售网络被彻底重构，改由香港杂志公司成都分公司和东方书社进行推销。<sup>④</sup> 但仅三四个月后，便由于存在的协调问题导致部分通过代售处订阅的读者无法收到刊物，严重影响到了刊物的信用，因而停止合作，不再设置分销和代销点。<sup>⑤</sup>

在建设销售网络的同时，《医药改进月刊》还推出了“奖励读者介绍订户”活动。即“凡一次介绍订户在十人以上者，除由本刊登刊奖励外，并赠阅本刊全年一份”。<sup>⑥</sup> 这一活动很快收到了成效，次月的刊物上便登载了一则奖励启事：“本刊重庆读者刘应岐君，对于我国医学改进，素具热忱，近更一次为本刊介绍订户二十二人，此种服务精神，殊堪钦佩，除按照本刊优待条例予以优待外，特再登刊奖励，以谢热忱。”<sup>⑦</sup> 该活动在一年的时间里使《医药改进月刊》增加了订户一百余人，占总销量的一成以上。<sup>⑧</sup> 通过这一渠道，刊物扩大了读者群体，使其影响范围覆盖全川并扩展到外省部分地区，同时介绍人也从中受益，达成双赢。

但是从长远来看，《医药改进月刊》的宣传推广并不成功。“奖励读者介绍订户”的活动虽然吸引到了一些订户，但并非长久之计。所以，经营状况最终导致其被迫停刊。

#### 四、《医药改进月刊》的停刊

1943年10月，《医药改进月刊》第3卷第7期出版，这是目前所见的最后一期。然而，该刊所面临的经济危机却由来已久。

《医药改进月刊》在注册之时所登记的资本数目为5000美元，日常运营的一切费用“由基

<sup>①</sup> 《成都简讯》，《新华日报》1943年10月16日，第3版。

<sup>②</sup> 谭珊：《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市民消费生活水平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121页。

<sup>③</sup> 《医药改进月刊》1941年第1卷第2期，第20页；《医药改进月刊》1941年第1卷第4期，第20页。

<sup>④</sup> 《医药改进月刊》1942年第1卷第11期，第20页。

<sup>⑤</sup> 《本刊紧要启事》，《医药改进月刊》1942年第2卷第6期，第2页。

<sup>⑥</sup> 《本刊奖励读者介绍订户启事》，《医药改进月刊》1941年第1卷第4期，第2页。

<sup>⑦</sup> 《本刊奖励读者介绍订户启事》，《医药改进月刊》1941年第1卷第5期，第19页。

<sup>⑧</sup> 在1943年10月成都市政府组织的刊物调查中，《医药改进月刊》每期销量为1000份。见《四川省成都市现行刊物调查表》（1943年10月2日），成都市档案馆，38—4—5759。

本社员平均负担”。<sup>①</sup> 根据对所刊基本社员名单的统计，该刊截至 1941 年底共有基本社员 60 人。<sup>②</sup> 而按照《四川省医药改进月刊社简章》的相关规定，基本社员入会时须缴纳每年 20 元作为基金、每年 2 元作为常金，并应在“本社经费不敷时”缴纳“特别费”来分担。<sup>③</sup> 随着物价的上涨，至 1942 年夏季，原本的基金规定已涨至 100 元，常金则按照刊物全年定价的三分之二征收（这一时期为 12 元）。<sup>④</sup> 1943 年，刊物的运作愈发艰困，不得已只能向读者募集资金。1943 年 4 月 1 日出版的第 3 卷第 2 期杂志刊登了两页篇幅的《医药改进月刊社劝募基金运动启事》，截至停刊，共募得捐款大洋 310 元和法币 465 元。<sup>⑤</sup> 但这对于医药改进月刊社而言显然只是杯水车薪。

李斯炽并非只将希望寄托于募捐，他还想到了向政府求助。6 月 12 日，他以医药改进月刊社社长的身份，向成都市政府及四川省政府请求补助，他在呈文中写道：

窃属刊以发扬固有医药文化，维护国民健康为职志。创刊以来，迄已三年，绳索私人力量苦心经营，惟当此百物飞涨之际，以私人有限力量，实难以应付此无穷之变化。窃思本刊乃学术团体之一，对祖国固有文化之发扬暨同胞之健康不无小补。我政府当不忍坐视其夭折。……钧府恩以辅助文化团体之德意，俯念创刊之苦衷，核转四川省政府，依照补助文化团体办法，予以经常补助，避免停其刊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sup>⑥</sup>

李斯炽的语气显得诚挚而迫切，但当成都市政府将他的诉求上报四川省政府后，省政府于 7 月 9 日回复表示，本年度有关县私立学校和文化团体补助奖励部分的预算开支“早已分配无余”，让医药改进月刊社“于下年度开始时另文呈请”。<sup>⑦</sup> 李斯炽似乎从省政府的回复中看到了一丝希望。当年年底，即停刊两个月后，他再次通过成都市政府向四川省政府申请补助。<sup>⑧</sup> 1944 年 1 月 11 日，省政府表示将会“提交三十三年度本府奖励县立私立学校及文化团体审查

<sup>①</sup> 《新闻纸杂志登记声请书》（1941 年 3 月），成都市档案馆，38—4—5145。

<sup>②</sup> 《本社基本社员题名》，《医药改进月刊》1941 年第 1 卷第 2 期，第 19 页；《本社基本社员题名（续）》，《医药改进月刊》1941 年第 1 卷第 4 期，第 20 页；《本社基本社员题名（续）》，《医药改进月刊》1941 年第 1 卷第 10 期，第 2 页。

<sup>③</sup> 《四川省医药改进月刊社简章》，《医药改进月刊》1941 年第 1 卷第 2 期，第 18—19 页。

<sup>④</sup> 《本社社员大会记》，《医药改进月刊》1942 年第 2 卷第 6 期，第 38 页。

<sup>⑤</sup> 《医药改进月刊社劝募基金运动启事》，《医药改进月刊》1943 年第 3 卷第 2 期，第 31—32 页；《本刊致谢》，《医药改进月刊》1943 年第 3 卷第 4—5 期合刊，第 32 页；《本刊启事》，《医药改进月刊》1943 年第 3 卷第 6 期，第 34 页；《本刊致谢启事》，《医药改进月刊》1943 年第 3 卷第 7 期，第 33 页。

<sup>⑥</sup> 《医药改进月刊社为恳予转详四川省政府依法补助事》（1943 年 6 月 12 日），成都市档案馆，38—4—5145。

<sup>⑦</sup> 《四川省政府指令教一字第□号》（1943 年 7 月 9 日），成都市档案馆，38—4—5145。

<sup>⑧</sup> 《医药改进月刊社请转呈四川省政府发给医药改进月刊补助费由》（1943 年 12 月 15 日），成都市档案馆，38—4—5145。

委员审核后”，再决定是否对李斯炽的医药改进月刊社进行补助。<sup>①</sup> 审核的结果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停刊三个多月之后，《医药改进月刊》已无法起死回生了。

## 五、结语

《医药改进月刊》由李斯炽创办于中医事业亟须改进与振兴之时。从传播内容上，该刊刊载了一系列改进中医药的言论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大量的中医药学术文章的刊载增强了刊物的学术性，医药卫生常识类的文章也提高了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此外，医学专著的连载使得很多珍贵的医学文献得以传世，读者来信则为医者和读者之间搭建了一个信息平台。但是，该刊的经营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广告业务迟迟未能进入正轨，而销售网络的建设则多次变动。在物价不断飞涨的情况下，本刊只能被迫一次又一次调高销售价格。而“读者介绍读者”等推销方案在初期有所成效后，并没有长期实行。募集资金、向政府申请补助等方法都没有挽回本刊濒临崩溃的财政状况，无奈只能以停刊告终。

《医药改进月刊》的创办，代表着中医药界对于形势的判断以及救亡图存的努力思路。正如该刊的发刊词所言：

盖自欧风东渐，西学日兴，自欧洲来者设医院于通都大邑，且广为宣传。而国人之不明医理者，见其设备之精，使疾者得所安养，即认为西医之高于国医者一也。我国医药因历史悠久，已迈实验解剖而入神话，且每有议论，又多近于哲学。不若西医之，造模型，制标本，明白易晓，所谓中医不如西医之熟于人体，组织者二也。<sup>②</sup>

因此，无论是兴办四川国医学院，组织国医学会成都市分会，还是创办《医药改进月刊》，李斯炽等人一以贯之的思路是推动对西医体系的模仿，通过现代的学校教育体系、职业团体<sup>③</sup>和专业性的报刊企图重塑民众对于中医药的信心。然而，照搬西医的套路显然并不适合中医药行业的现实条件。而在西医主导的话语体系下，当中医药踏上提前预设好的科学化道路时，它便逐渐被剥离出了所赖以生存的传统网络，进一步在中西医的竞争中陷入被动。<sup>④</sup>

<sup>①</sup> 《四川省政府据该府转呈请求省款补助医药改进月刊社一案仰候提会审核后另令饬遵由》（1944年1月11日），成都市档案馆，38—4—5145。

<sup>②</sup> 《发刊词》，《医药改进月刊》1941年第1卷第1期，封面页。

<sup>③</sup> 蔡晴：《从“国医公会”到“中医师公会”：民国时期成都中医职业团体的兴衰转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

<sup>④</sup> 雷祥麟：《常山：一个“新”抗疟药的诞生》，李建民主编：《从医疗看中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73—374页。

在《医药改进月刊》的背后，还有着报刊业在1943年乃至在整个抗战时期所经历的艰难与波折。抗战时期四川出版报刊，要经历包括登记、稿件检查、纸张印刷垄断、发行、物价、特务、日寇轰炸、编辑人员生活困难等诸多关卡。<sup>①</sup>因此，据不完全统计，仅成都地区在1943年下半年停刊的刊物就有《新新新闻旬刊》《华文月刊》《田家时事特刊》《太平洋月刊》《建国季刊》《文艺创作》《交通周刊》等近十种，<sup>②</sup>其中原因虽不尽相同，但这些刊物的创刊者最初无不抱有一腔热血，现实最终还是让他们屈服。

作为一份中医药期刊，《医药改进月刊》的境遇也是这类专业学术性刊物所共同面对的。它的专业性注定其很难“人人必读，家家必备”，但为了生存和发展，这些期刊又需要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虽然国民政府对于文化学术团体有专门的补助，医药改进月刊社也曾试图通过这一渠道延续刊物的生命，但事实上，数额不多的经费并不能满足众多学术刊物的需求。1935年，顾颉刚曾因禹贡学会经费之事求于教育部，仅得一次性津贴300元，“以顾的社会声望和活动能力，结果尚且如此，其他刊物可想而知。”<sup>③</sup>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动荡年代下学术生态的一个缩影。

（作者陈宇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 徐登明：《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期刊》，《新闻界》2005年第5期，第25页。

② 王绿萍：《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1897—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王建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专业期刊与史学革新》，《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第122页。